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十）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九期 ——  
（二〇〇一年二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2 a）

【史海钩沉】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苏双碧
关于《出身论》	遇罗文
遇罗克喋血记	王晨·张天来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 苏双碧 •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20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 遇罗克母亲的一封信

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到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

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哽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伸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伸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1. 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2. 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3. 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她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份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保存遇罗克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把这些材料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人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半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 ◇ 《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1966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

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惟成份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份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于1967年4月13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196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的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

两条指示：1.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 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 ◇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1966年1月2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5月13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

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的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的无端指责。

#### ◇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1970年3月4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杀不可？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准逮捕遇罗克。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

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又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追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这样的话，并因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致，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竟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

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分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 ∞ ∞ ∞ ∞ ∞ ∞ ∞ ∞ ∞

### 关于《出身论》

• 遇罗文 •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65中上高一，那时我哥哥已经参加工作，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在这之前，他在大兴县的红星农场当农工。小的时候对哥哥的记忆，就是他特别精力旺盛，也特别聪明。在家时，他会搞些恶作剧，编鬼故事吓唬人。我的姥姥很讲迷信，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能吃荤了，但是他反对迷信，他就偷偷往菜里加点猪油。当时我们的家境特别困难，兄弟姐妹四个基本靠母亲的工资维持。他当农工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自己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讲穿戴，几乎全部拿给家里，母亲说，你总得自己留点钱呀，每月给他留几块钱，而他唯一的花销，就是买书。后来他回到城里上班了，原来他在农村时怎么读书，我不太了解，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实在是太用功了。他到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他和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次能借100本书的。我跟他到图书馆一起去借过书，他都借的是那种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当时我看着他借的一摞摞的大部头书，觉得简直是永远也看不完的。

关于我哥哥写的最有名的文章《出身论》的前后，在这件事上我最有发言权，因为登载《出身论》的那张报纸是我办的，就是《中学文革报》。他是在报纸办起来以前就写出文章了，写的原因，就是看到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造成的大量惨剧。许多人被活活地打死。他写完文章时，我和我弟弟正在广东串联，他当时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文章给我印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印东西是很难的，当时只能油印，但是一套油印机又很贵，我们买不起。我到了广州，发现他们那里搞油印是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把蜡纸刻好蜡版以后，铺在纸上，只用一块木板夹着一条蘸了油墨的橡胶，就这么一刮就印出一张。发现这个方法以后，我马上写信告诉他说我能给你印，这样他就把写好的原稿给我寄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印了几百份，印好的一部份给他寄回北京，一部份就在广州街头贴了出来，想看看反映。结果当时就很轰动。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这种印刷方法介绍给我哥哥，他又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纸，又印了不少，当时我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北斗星战斗队”，我们又在北京的大街上贴了不少。当时我们就有四中的两个同学牟志京和王建复加入进来。牟志京是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了贴的《出身论》后非常佩服，找上来的。他们俩找到我商量，说能不能办一个铅印的报纸，我当然很赞成。我们是和四中借的500元钱出的第一期。第一期印了3万份，《出身论》就登在这期上，卖2分钱一份，在街上一抢而光，又加印了6万份。以后我们又接着一共出了六期，每期都是靠上期卖报的钱来运转了。当时我们几个人我负责组稿、卖报；王建复主要是组织和财务工作；牟志京主要是编稿。这六期报纸，每一期的主要文章都是我哥哥写的，一些小文章也是他组的稿，或者他编的，他有时充当正反两方面的角色，在报纸上展开辩论。这份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读者来的信都是成麻袋成麻袋的

，邮局都送不过来，得我们自己去取。有许多人在信中夹了钱要买报纸，我们就得给人家寄，工作非常忙。人手也增加到十来个。这期间，《红旗》杂志社的人也来找我们，慢慢也知道了文章是谁写的了，他们有一天就对我们的人说：这篇文章我们认为有问题，你们最好还是转转方向。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了。而且那些红卫兵“联动”也捣乱，常常找到印刷厂去抢去砸，有一期报纸我们不得不跑到天津去印的。这种情况下有一部份人就撤了，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坚持，一直到第六期出来以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这时我们不得不停刊了。前前后后，从1月18日到4月14日，出六期报纸共印了40万份。我哥哥的主要东西都在这六期上。

## ◇ 恶运开始

在《中学文革报》之后，我哥哥还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工资论》，这是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他已经在考虑改革中国的工资制度问题，他还有一个计划，想把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收集起来，论述其中的剥夺人权不讲人性的东西。他还想写过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在中国当时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犯过一次错误，很可能你终生都会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前途也就完了，他想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人可能比血统论涉及的人还要广。

但是这个时候风声已经很紧了。第一个征兆是我哥哥发现有人跟踪他。但是他并不怕，他还很乐观，因为他觉得他没做什么坏事。他对我说，有时候他还会迎着跟踪者上去问：你是找谁谁吗？他往哪哪去了！有一次，我们两人去东四人民市场，发现有两个女的跟踪，他就和我忽然就藏在一个柱子后面。那两个人不知道，还在往前走，他突然就出来问：你们找谁呢？那两人赶紧就走掉了。我哥就说：“你看多可笑，就这水平还跟着我！你别看我怎么跟他们逗，他们回去也不敢说，一说不丢他们自己的脸吗？”那时候我们都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总觉得我们干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在报纸上，你们都看得到的，没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没想到，到了1968年的1月5日，我哥哥被捕了，我是被“群众专政”，是被学校看管起来，到了三月份，也进了监狱。这个案子牵连了很多。因为我们的报纸读者来信很多，有写得特别长很有水平的信，我哥哥都是亲笔回，也写得非常长，这样，就被怀疑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外地的这些人也都被牵连进去，我记得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等，都被判了十几年的刑。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

在我被捕后，我们家曾经托人打听过，内部定的是给我判三年，我哥哥五年。但是我最后也没被判，转到一个少管所办的“学习班”，跟我在一个“学习班”里的什么人都有：有写反动标语的、当红卫兵“联动”打死人的、投敌叛国的、“五·一六分子”等等。三个月后，我就放出来了。可是我哥哥却没能出来。

在我和哥哥被抓起来不久，我母亲和我弟弟也被“群众专政”。这种“群众专政”就是不关进公安局，而是由本单位来看管，同样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要劳动、交待问题。我被群众专政时，还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与我们一起办报的唯一一个



大学生，名叫郝治，他受的罪就大了。他被关了一年，其中前半年每天只能吃到6两窝头和一点咸菜，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屋里，每天都要被毒打一顿。到了半年的时候，他1米8的个子只剩下90斤的重量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不能有活的可能了，就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几乎要死了，这样关他的人才同意不打他，也允许他可以出屋子了。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棉袄已经被凝成了一个血壳。半年里他一直睡在水泥地的草帘子上，等到半年后出来时，一甩草帘子，是一层的臭虫。他的胡子有半尺多长，也被血凝在一起。他又被关了半年才放，他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去慰问我妈。

我的弟弟是被“群众专政”了两个月后放回家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找了一份临时工，母亲还在被群众专政，我们都在监狱，我的姐姐遇罗锦在茶淀被劳动教养。我弟弟进了家门，看到屋里一片狼籍，所有的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土，米面已经长了虫。我弟弟先去看我母亲，我母亲被剃了阴阳头，正在监督劳动，见到我弟弟悲喜交加，说：我不要紧，这里能在食堂吃饭，饿不着，还是先去想法给你哥哥姐姐送点东西吧！我弟弟想给我们送东西，但那时我们都没被判刑，不让见面，也不能送吃的。他又去茶淀看我姐姐。临走在家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了两元钱，也买不了什么吃的，只能把家里的面粉挑去虫子，炒了些炒面带去。到了茶淀，又费了很多口舌才被允许见到遇罗锦，一见面，姐弟俩就抱头痛哭。

当天晚上我弟弟住在了农场，但是农场规定亲属探望一月只能一次。这样，我弟弟就第二天一大早站在路边等，希望能再看到姐姐一面。上工的队伍过来了，终于，我姐姐看到了弟弟在招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弟弟在回去的路上，到火车站要走十几里路，他来时是走来的，回去还要走回去，这一路，他是一直哭着回去的。他那时是上初三，只是个十六七的孩子啊！

我从监狱放出来后，就去陕北插队了，后来我弟弟也来这里和我在一起。真正听到我哥哥的死讯是在陕北。我万没想到他会被判那么重。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军代表还说，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还不给你哥写封信，让他加强思想改造，争取也早点放出来。我就真写了，那会儿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记得那年，就是在1970年春节时，我和弟弟、姐姐都从外地回到北京过年，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可是当时街道的人看见了就紧张起来，问：你们怎么忽然都回北京了？是不是想闹事啊？非得让我们回去，不许在这里多呆。我们怕他们再通知我们插队的地方，那样以后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不好，就只有回去了。临走前，姐弟三人照了张像，也不知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正是我哥哥要宣判，我父亲就和我们约定好暗语，写信以“霞”来指我哥哥，如果是最不好的消息，就是“霞走了”。没想到回到陕北不久，就接到父亲“霞走了”的信。当时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在前不久回北京时，还有一个警察来我家调查过他的事，问我们对遇罗克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这人也未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把我说的都记下来了，说向上汇报。我真以为我说的能有点什么作用呢！

后来我才知道，在公安局的人来宣布我哥哥死刑的消息时，当时我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人也坐到了地上，受不了了。而那些人的不同情你，还说哭什么？你们应该划清界限！可我母亲非常坚强，她就是不哭。她就是说，你不要当着他们哭！在她死了以后，我们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她受的打击有多大。她是因气管炎肺心病死的，最后一次发病，正是在我哥哥的生日那天，她想起了我哥哥，在日记里写了。宣判我哥哥的工人体育场，她从来不住那去。就是那天她犯病后，住进医院就再也没出来。

◇ 关于宽恕

1979年，在我哥哥平反时，公安局的人问我父母：有什么要求？我父母没提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只是说，你们把罗文给我们弄回来——那时，我因为哥哥的牵连，又第二次进了监狱。

我从东北监狱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公安局说安排很困难。这样最后我对他们说，能不能进我哥哥呆过的人民机器厂？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我进了人民机器厂，这个厂后来对我很好。后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下了海，现在在一个公司里任总工程师。这些年，有一些当年曾经对我不起的人托人找我，比如当年检举我藏手榴弹的人，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的“专案组”的人，请求我的原谅。比如当过我的“专案组”的同学，现在美国，打听到我的电话后，从美国打电话给我，首先就是请我原谅，我毫不犹豫就原谅了。可能我回答得太快了，出乎他的意外，他觉得我可能在敷衍他，就说：“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坏事，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整人……”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么做也是本能的，上面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努力去干，但他们没有是更恶的那种，人家没让他去打人，他们却以打人整人为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原谅他。无知造成的错误，我可以原谅，我不能原谅的是人品质上坏的那种人。真正能忏悔的人，是有勇气的人。

我记得我哥哥当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拿棍子打你，你想还击，你是打这个人，还是打这个棍子？对于一个个具体迫害我们的人，我不恨，他们也不值得我恨，有的时候，有些人并不是对我们不好，他们是对那些打入另册的、比如“黑五类”这样的人同样是很残忍，他们同样值得恨。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人，只是这个社会当时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要是恨，只能说恨给这些人机会的人，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如果还有这种政策，就还会冒出一大批这样干坏事的人。

∞ ∞ ∞ ∞ ∞ ∞ ∞ ∞ ∞ ∞

遇罗克喋血记

• 王晨 • 张天来 •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明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智慧之星。

◇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了。

在老师教育和社会影响下，小罗克努力提高觉悟，刻苦读书，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王老师特别欣赏他那初露才华的作文，他的不少作文成了供大家学习的范文。同学们见他瘦小的个子，小大人的神气，和那副小近视眼镜；都亲热地管他叫“小

学究”，遇到问题常来问他。没有歧视，没有隔膜，师生们相处得多好啊！孩子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学好本领，快快长大，好去参加祖国的建设。

那么，是遇罗克后来不够努力了？不是。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还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天不看完五十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古人能头悬梁，锥刺股，卓娅能用冷水浇头，我为什么不行呢？困了，就同自己的瞌睡虫做斗争！”是遇罗克背上家庭包袱，自暴自弃了？也不是。反右中，罗克和妹妹有一天开抽屉时，发现了妈妈写的“检查材料”。被高压“压”出来的“交代”，尽是夸大不实之词。罗克读毕愣了好一会，半天才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照革命导师的话去做，真理永远是真理。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是，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

给课外文学小组讲学的两位老教师，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反右开始不久，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过了些日子，叫同学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罗克在会上一直沉默着没说话，从脸上可以看出他内心很痛苦。散会后他对同学小王说：“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共青团员，一句笑话怎么能叫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呢？大家听讲时全笑了，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一份！”

而后，大炼钢铁的浪潮把学生们席卷进去。校园里建起十几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轰响。罗克最初觉得挺有意思，他和同学一起终日奔走于炼钢炉前，当他也像别人一样兴致勃勃地从炉子里钩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时，他有点疑惑了：“这就是钢吗？”细细端详一会儿，他执著地说：“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是把它烧结了。”一句大实话，当即招来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遇罗克心里就是不服。后来这些“蜂窝钢”一直堆在校园里，日晒雨淋使它生了锈，“蜂窝”里居然长出了野草。遇罗克旧话重提：“是钢为什么不拉走？”结果，他又一次因“否定大炼钢铁伟大成果”而受到了批判。

遇罗克对非要学生参加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十分反感，他从这个时期开始钻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对同学说：“这样不去读书，坐而论道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尤其使遇罗克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这时，有的老师看见出身好的同学就笑脸相迎，看到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冷眼相看，很使遇罗克愤懑不平。“我认为，人们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1959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罗克同一位同学谈及这个问题，从北池子一路谈心一直走到北海公园。他感慨地说：“马克思、毛主席、鲁迅，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可他们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如果说他们主要生活在旧时代，受到的家庭影响尚且如此之小，到了新社会为什么要把家庭看得这么重呢？”后来，他们还谈到什么是政治觉悟，罗克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首先是觉悟到自己阶级的使命和对重大政治是非问题有比较正确的判断，随风倒绝不是觉悟高的表现。”同学问：“你这种看法谁承认呢？”罗克认真地说：“我不在乎人们承认不承认，唯心主义者不承认物质，物质依然存在。”

遇罗克没有被命运的一次次打击击倒，他照样发愤努力，从思想上、学习上提高自己。高考临近了，遇罗克清醒地估计到这一关的考验，尽管他知道自己文理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他还是报了地质专业。他想，报考这个冷门也

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考试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天天跑步，练哑铃。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响起欢快的歌声，那是他最爱唱的《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  
踏遍了层层的山峰……

◇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却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们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真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隐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父亲劳改去了，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块钱度日，给小罗克的零用钱更少，喜欢吃小吃的他再不去买一支冰棍、一口零食，也不要一件新衣服，只是用不知多少日子才攒下的一点钱买自己喜爱的书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作家的《金蔷薇》等，就是这时买下的。

住房比过去小多了，一家挤在一间半小屋兼厨房里，出出进进，纷纷攘攘，罗克怎么能看得进书呢？他问母亲：“能不能把装煤的小屋腾出来，让我住和念书用？”“那怎么行？没窗没门，又黑又潮，是住人的地方吗？”“没关系，我去和房管所商量，请他们来修一修安个门。”

不久，这间夹在两屋之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果然修好了。

“墙上一定得挂点什么。”他对妹妹说。“挂风景画吧？”妹妹说。“不，我有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画‘逆风’、‘奔马’，你看怎么样？”妹妹拍手叫好。罗克还亲笔写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条幅挂在床头。从这几幅淋漓酣畅的字画和生机勃勃的墨迹，就可以多少了解主人有怎样的心胸和情愫了。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孟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当他驾着求知的小船，航行在古今哲学的浩瀚海洋时，他发现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人类前进；又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正确的。”一找到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就首先勇敢地解剖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改正，这个世界便会少有许多虚伪和欺骗。”他下定决心：“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辩证观点，立志做个完人。”

高考越临近，罗克的心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90分，可他又担心家庭问题会影响高考的录取。

是的，在教育部门存档的成绩单表明，他考得确实很好。然而，考得好就能录

取吗？仅仅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中”哟！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整整一天，罗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说一句话，不喝一滴水，不吃一口饭。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这对一个上进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亲人们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响。一片愁云笼罩着这个家庭。

遇罗克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打开小灯，铺开稿纸，一只手插进黝黑、蓬乱的头发里，一只手奋笔疾书：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却有一颗赤子之心……”

这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的心灵在呼喊，也是对唯成分论的控诉和批判！

那一夜，小屋里的灯光亮得时间更长，微弱的光线把遇罗克的身影投射在“逆风”与“奔马”的国画上，主人的心情和他喜欢的艺术作品的意境是多么合拍：逆风能练出骏马，逆境能磨炼出巨人！

“妈妈，我考虑过了，咱们家经济条件确实困难，但希望让我再考一次大学，作为社会青年去考，也许就没人从中作梗了。”母亲咬咬牙关答应下来。

罗克为第二次考试继续紧张准备。每天一大早他就出发到北京图书馆去，像上学一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中午吃一点从家带的饭，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回到家里夜以继日，挑灯苦读。

鉴于家庭经济情况，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边准备功课，边准备参加工作。母亲原本希望他去工厂，但他自己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便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罗克就兴冲冲地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他磨炼自己的心情是那么真诚，对待艰苦的农活是那么热情，使他很快同社员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许多社员亲切地叫他“伊拉克”。选他当了记工员。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青年伙伴，劳动之余刻苦攻读，认真切磋：从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论“美”，到电井池液面高度与出水口流量的函数关系；从王安石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到夏目漱石的“四碗炸虾面，但不得笑”。间或吟诗练字，创作小说诗歌。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遇罗克在农村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罗克总是“重装上阵”，三伏天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他就是在这里，穿着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遇罗克和同伴们为之振奋。这回考大学该有点希望了吧？罗克他们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他们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1963年秋后，罗克为了更好地读书，到附近村里租了一间农舍来住，这间小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伸手几乎能摸到糊着报纸的顶棚。菜园小队的许多青年家在这村里，时常有人来找他聊聊，或托他在城里办点杂事。但都不多坐，因为壁上贴着一张纸条，严格要求着客人：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到隔壁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就在这样的陋室里，这样的溽暑寒冬的环境中，遇罗克在苦读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他的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涉猎面既广且深。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更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却因作者“家庭问题”而不能发表。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1964年初，他因病回城。临走前，他在自己小屋的墙壁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诗言志”，短短两句，足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境界。

◇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遇罗克养病期间，每天仍然去首都图书馆读书。两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在一所小学代课，虽然由于认真负责，他在这些单位都曾受到表扬，但是，一翻档案，谁敢要两个“右派”的儿子？

没有一个固定职业，遇罗克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所谓“路线问题”，当然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转过年的春天，仍在农村的一位好友忽然接到遇罗克一封求助信，请他代答一大串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习题。好友不明白，怎么罗

克突然又对数学感兴趣了？不久他去罗克家才发现，原来他为了读懂康德和黑格尔的原著，正在自学“高等数学讲义”。

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像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

多少个日夜学来的马列主义观点，多少次苦读掌握的文史哲知识，多少回写作练就的犀利文笔，此刻从笔端奔涌而出。短短的时间里，一篇1万6千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1万5千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草就了，又一篇1万4千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篇篇文章像阵阵排炮直射姚文元一伙的要害。

在《论“清”官非“官”》中，他肯定了“清官身上是有人民性的”，指出“对于清官身上的这些人民性我们要不要继承？姚文元……表示不能继承。谁要继承谁就是要搞垮人民公社，谁就是要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其罪莫大焉”“清官比贪官更坏。……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啊！”这样的文章却不能见报。《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尽管他看到版面编排对他不利，尽管父母亲友都为他担心，他却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他写道：“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在这场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论战”中，这位二十三岁的“黄口孺子”就是这样不畏权势，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发起了反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晴朗的天空霎时间被搅得乌云翻滚，地暗天昏。政治生活如此反常，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刺过铺天盖而来的夜幕，对发生的一切做了敏锐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然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在5月23日日记中还写道：“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纸都是

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这时，他已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诋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份青少年的狂热性。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着：“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据说红卫兵砸人家的，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人家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他还嘲笑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刮起的那股改名之风，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50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50多面红旗了！”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966年8月28日中午，罗克把妹妹喊到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镇静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下，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天快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地方，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当做“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当啷一声，家门被推开了，遇罗克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站在门前。深蓝色的夜空把他的脸庞反衬得更加苍白、严峻，锐利的目光直刺前来抄家的人群。他目光炯炯，神色从容，有如一尊凛然不可亵渎的雕像。

“你先给我跪下！”有人朝罗克的后脖梗狠狠一击。

“你打人？！”罗克猛然转过头来，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对方，竟使那家伙一下



缩回了手。罗克却高声说道：“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请问，你们是怎样看待出身问题的？”几个家伙被问得理屈词穷。正在这时，遇罗克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1966年9月×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乾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

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

回答是：不。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份论的左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到赤裸裸的封建血统论了，批判它，澄清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十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怅惘、不平、愤慨、觉醒，此刻像地下运行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心向戕害青年的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宣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他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指出“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他在论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当笔锋转向“重在表现”问题时，罗克首先论证了出身与成份完全不是一回事，驳斥了“唯出身论”，指出：“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痛斥血统论的卫道士：“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

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不是一篇墨写的文章，而是一位勇敢捍卫真理的战士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战斗宣言。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晴日，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

原来，《出身论》完稿后，他先寄给党中央，没有回音，继而准备发表。但是当时的小报不肯刊登这篇文章，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在广州串联的弟弟来信告诉罗克一种最简便的用钢板油印的方法，他立即从每月16元学徒工的工资里拿钱买来纸张，借来钢板，和妹妹弟弟一起油印了几百份。

“哥哥，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名字呢？”妹妹问。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浮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深为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点，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1期3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6万份，又立即售尽。

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等小报上。他在文章中说，反动对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特别点出了血统论的封建根基。他还推荐刊登了一篇几位初中学生支持《出身论》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析了封建社会里世袭制度、科举、宗教等与血统论的关系，他认为写得很有道理。刊登这些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为此声名大振，《出身论》在许多地方不胫而走。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开始，邮递员每天送来一大堆来信，不久，邮递员“拒绝”送了，因为，实在多得他拿不动，编辑部便每天派人用麻袋去装。来信中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热情的希望，无时不在激动着罗克的心。来信人不仅有所谓“黑七类”子女，也有“红五类”的后代。贵阳一位青年在来信中说，他在街上读到《出身论》，触文伤情，痛哭失声，无法读下去，跑回家呆一会再来读，又哭得读不下去。几次读，几次哭，才把全文读完。遇罗克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来信不仅使他了解到人们对《出身论》的反映，还给他提供了许多血统论猖獗的情况，就与同伴一起记下了一些来信人的地址，还同一些人进行通讯联系。谁能料到，到后来这也成了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证据”。

当然，《出身论》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和咒骂。报纸被撕碎，被抢走，卖报的和读报的被围攻，被殴打，是常有的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遇罗克始终坚强不屈。4、5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明确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一个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诚恳地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驳斥了对它的诬

陷，光明磊落地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但是，五封书信，均无下文。罗克忧思万千，他在5月8日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一次，一群人把他整整围攻了一下午，名为“辩论”，其实是又推又打。正当家人着急时，罗克斗志昂扬地回来了，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

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不久，他上街去，发现有人老跟着他。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这时，中学红代会压迫《中学文革报》发表声明承认《出身论》是反动的，遇罗克和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报纸只好被迫停刊。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罗克坚决地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勇敢的声音！”

处境虽然险恶，罗克泰然自若，又研究起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来了。1967年下半年，他撰写了一篇《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份，其余部份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曾以自己的工厂为例，这样对同伴说：“工厂想要一部新设备，先要由技术员向厂领导提出，工厂再向市里申请，市一级再转部一级，一个部再通过几个部，转来转去。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一个青年在当时就能看出这些问题，他的思想是多么锐敏！

遇罗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弊病，但他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从不动摇的。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

“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1967年底，罗克像往常一样，做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千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做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最后，他深情地写道：“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几个年轻伙伴正聚集在罗克的小屋里，罗克进来了。那天他谈话的兴致很高，当谈到一些青年思想混乱，有的甚至想出国时，罗克讲了几句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多少年后，同伴们一想起罗克，耳边就响起了他那正气凛然、斩钉截

铁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五天，遇罗克被捕了。捕前他曾请一位好友给自己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他把革命先烈的诗句铭刻在心底，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当晚7时45分至11时35分，进行了第一次“预审”。遇罗克一开始就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他说：“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的日记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然而，近4个小时的审讯，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真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员气得大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五九年到六三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其实不是现在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吗？

身陷缧绁之中，遇罗克还是非常渴望读书。他给家里写了一张纸条，开列了十几本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还要一本俄文本《毛主席语录》。哪知狱中除了《毛选》，别的什么也不准看，更不用说读外文了。

“咱们聊天吧！”遇罗克向也是受迫害的几位难友提议。他同在水泥厂工作的青工聊水泥生产过程，同在美术学院学美术史的学生聊美术，无形中又学到许多知识。狱中学习时，罗克有机会就给大家讲毛主席诗词里的典故，有时还引申到唐诗宋词、平仄规则等。他讲时的神态，哪里像个囚徒，俨然是个“教授”。他还给大家讲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可惜大多数人认为太抽象，难听懂。

“你能听懂吗？”罗克问学美术的大学生。

“能。”

“你对哲学有兴趣吗？”

“不大感兴趣。”

“不行。学哲学不单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锻炼的

过程。学哲学能使你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有所提高。”

后来，他们两个又一起搜集古典诗词，从《诗经》直到清代，能记起来的都抄在撕成条条的用来写检查的纸上。两个多月功夫，积累了不少诗词。不料，在一次查号中被没收了。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这是很紧的铐罚，吃饭时打开，血液刚开始循环，毛细血管又胀又痒，疼痛钻心。饭后刚好受了一点，铐又被立即扣上，更加难受。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开始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在第44次审讯中，当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听到话音里的杀机，起初有点愕然，难道凭这点材料就定死罪吗？继而他镇定下来，冷冷地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在之后的又一次审讯中，罗克再次强烈地抗议：“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

谁能听进他的话呢？在又一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

“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审讯人员和记录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呼啦啦拥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我的牙膏用完了，请让我家给我送一袋牙膏来。”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像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那位学美术的大学生问他。

“值得。……你对家庭问题没有体会，而我两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例。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但是，世界上哪有一个无辜的人愿意含冤死去呢？遇罗克向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被判处了死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遇罗克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有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凛凛正气，有的是不怕死不变节的耿耿丹心。生死早已被他置之度外，惟一遗憾的是还有许多书未读，还有许多文章未写，还有许多事情未做，那只有留给朋友、弟妹，留给后来的青年同伴去完成了。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在狱中的诗篇吧！

## 纪 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  
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

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  
风雪日夜甘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  
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片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认识遇罗克的同志亲眼看到，被剃光头、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进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专制，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七岁。家人去领他的遗物，看到有一副眼镜、一枝钢笔和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背心，直到死他也没舍得穿这件背心。

十年之后，我们到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探访遇罗克的遗迹。他的一家人已经迁走了，他的小屋也改建他用。真正是“物去人非”。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思想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呢？看今日，他生前痛恶的现代迷信，他坚决反对的封建血统论，正在受到日益深入和彻底的批判；他的那些经济主张，正在化为现实；他所热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在大力发扬。他和许许多多无畏的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在人们心头播下的火种，终于熊熊燃烧起来了。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英雄的遇罗克，而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进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9月21日、22日  
转载于《那个年代中的我们》，1999年出版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刚（美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 t t p : / / W w w . c n d . o r g / h x w z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 T 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

---